

編序

台港兩個華人社會在過去一兩年都分別目睹了青年與社會兩者關係的巨大變貌，最明顯的是相繼爆發太陽花運動和雨傘運動，其次是青年面臨前所未有的工作和前途焦慮感。面對這種青年與社會變局，兩地社會學家自然會被賦予正視和解讀的學術責任。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與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早在 2000 年就開始一項長期的合作研究計劃，就雙方關注的兩地社會政治議題，進行定期的社會意向電話調查，蒐集實徵資料，舉辦研討會為調查所得作妥適的解讀，並透過出版專書，使學術研究發揮更大的社會影響。

歷屆研討會均由香港亞太研究所和社會學研究所共同主辦，在台港兩地輪流召開，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於 2011 年加入合辦行列。在此系列研討會發表的部分論文，由兩研究所陸續輯錄成書，迄今已出版六本，依次是《香港社會政治的延續與變遷》（2004）、《社會發展的趨勢與挑戰：香港與台灣的經驗》（2006）、《新世紀臺港社會風貌》（2008）、《解讀臺港社會意向》（2011）、《面對挑戰：台灣與香港之比較》（2013）和《一衣帶水：台港社會議題縱橫》（2014）。

第七屆研討會於 2015 年 5 月 1 至 2 日假中央研究院順利舉行，本書《台灣與香港的青年與社會變貌》乃是次研討會的論文選集，共收錄十篇，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闡述青年面貌，收錄五篇論文。

在第一章，丁國輝探討了華人社會管教孩子的價值取向。他指出，傳統中國社會對孩子的管教極嚴，着重子女聽話，順從父母訓誨。學者經常從傳統的角度描繪當前華人家庭的教養模式，近年傳媒更以「虎媽」來形容華人母親的作風。跟西方比較，華人社會的教養方式顯得不開明，有壓抑童真之嫌，甚至窒礙孩子的發展空間。華人社會的經濟在近半個世紀發展迅速，社會制度、行為規範、價值取向都發生基本的變革。華人家庭的教養子女模式不可能不變，傳統的框框未必能代表現今家庭的狀況。丁國輝繼而運用第六波「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比較中國內地、台灣、香港和新加坡四個華人社會在教養子女的態度，包括子女服從性與獨立性的相對重視程度，並評估與現代價值相關的自我表達和想像力的位置。研究發現，華人社會重視孩子的獨立性，也不強調下一代盲從，這兩者的傾向並不亞於其他社會，包括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對於孩子自我表達和想像力的重視程度，華人社會亦毫不遜色。分析更發現，教養子女的價值取向，其實與傳統觀念和社會結構認知有關，亦即家庭社教化的重點，是確保下一代的生存空間和增強他們的競爭能力。

社會急劇轉變，讓青年從學校過渡到職場愈趨非標準化與不確定，高中時期的職業導向對青年事業路向和成就的影響，亦日益重要，但當代青年大多對職業規劃缺乏瞭解，很難在升學或工作有務實準備。鄭慧婷展開一項「從中學教育過渡至高等教育還是工作？」的縱貫性重訪研究，在第二章，她運用近兩千名香港中五學生參與的調查所得，考察家長在職業方面的支持、家長在一般事務的支持和社會壓力，與青年職業導向（包括職業探索與承諾，及職業決策自我效能）之間的關係。她發現，家長對子女職業方面的支持能直接提高青年的職業探索與承諾，及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然而，家長對子女的一般性支持卻會減弱青年的職業導向，這表明華人文化在一般性的家長影響中可能存在特殊性。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相比，社會壓力更

容易損害職業探索與承諾。遭遇學業壓力、升學 / 就業壓力和一般性壓力的青年，更容易出現不理想的職業探索與承諾。家長在職業方面的支持，能緩解社會壓力對職業導向的不利影響，而家長的一般性支持，其調節作用則較為有限。根據她的分析，青年的職業導向不完全由家庭社經地位所決定，就業指導也不應停留在學校層面，今後的研究應探討如何培養家長對孩子的就業志向指導。

近年，愈來愈多青年參與街頭抗爭運動，他們的思想頓成為社會各方及學術界關注的議題。個人主觀福祉和政治態度息息相關，瞭解青年的主觀福祉，應有助剖析他們的政治行為。在第三章，趙永佳和黃子為運用最近十年的「香港社會意向調查」所得，探討不同年齡組別的主觀福祉趨勢及異同。他們發現，各年齡組別的主觀福祉都是先升後跌，只是升跌幅度不盡相同，年紀愈輕，升幅愈小，跌幅愈大；不過，香港青年不是變得不快樂，而是沒有如以往般比中年人和年長者快樂，此外，年齡與主觀福祉雖呈曲線關係，但非每一年都是U型，換言之，二者關係會隨時間而變動。他們再次證實，對香港前景愈樂觀者，愈傾向自覺生活快樂；可是青年對香港前景愈來愈悲觀，其中以在學青年尤甚，這可能是青年不再比其他人快樂，也因此轉向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原因。

一如前述，在2014年，台港相繼爆發大規模、以學生和青年參與為主的太陽花運動和雨傘運動。在運動前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與香港亞太研究所攜手進行了兩項相關民意調查，包括「中國效應調查」和台港「社會意向調查」。在第四章，林宗弘以「革命」形容這兩場社會運動，並運用中國效應調查，比較運動前夕台港民眾對中國效應與當地政府的評價。他檢證了三個中國效應影響民眾對現屆親中政府評價的理論命題。首先是族群政治與身分認同命題，即民眾的族群背景或出生地，會影響其主觀身分認同，進而影響對中國政策與政府表現的評價。其次是經濟利益與階級分配命題，即民眾的階級位置，以

及與中國的經濟利益，會影響其對開放貿易的評價，從而影響他們對中國政策與政府表現的評價。第三是政治轉型命題，即政治體制是否已完成民主轉型，會影響民眾身分認同本土化的程度，以及對民主政治的評價。林宗弘的分析證實，兩地資料大致符合這三個命題，身分認同與民主轉型與否，確實影響了台港民眾對中國政策與當地政府的評價。然而，兩地的階級政治結構並不一致，台灣受開放貿易衝擊的中下階級，較反對親中的國民黨政府，但香港中下階級中，內地移民較多，因此相對較支持親中的梁振英政府。

民心向背是決定社會運動成敗的關鍵。在第五章，蕭新煌和尹寶珊運用社會意向調查，探討台港民眾對太陽花運動和雨傘運動的觀感。結果顯示，兩地民眾對本地學運的支持度雖同樣分化，但台灣以贊成者佔上風，香港則以不贊成者稍多。另一方面，絕大部分台港民眾也都知道對方的學運，支持的比例竟都超過半數，但香港人對太陽花運動的態度無疑相對保守。社經背景對香港人是否支持雙方學運的影響力，都比台灣顯著；然而，無論是台灣還是香港，自覺傾向泛綠或泛民主陣營，以及贊成民主制度是最好的政治制度者，支持雙方學運的可能性，都較其他民眾高。在控制了社經背景，以及政黨傾向和民主支持度等政治態度後，「中國效應」評價（包括對本地民主政治、經濟成長、生活品質的影響）對台港民眾的學運支持度，大都具有顯著的獨立影響，即持負面中國效應評價者，傾向支持兩地學運的可能性就普遍偏高。

本書第二部分着眼社會變貌，共收五篇論文。

香港沒有退休保障制度，在人口日趨老化、長者數目急增、核心家庭愈趨普遍、出生率長期偏低的情況下，家人照顧長輩的能力乃持續弱化，如何保障老有所終，遂由私領域的代際反饋責任，演變為公領域的安老服務問題。在第六章，馬麗莊和尹寶珊運用「家人之間關係」入戶調查，勾勒香港成年子女與父母的相處情況，並從性別角度探討奉養父母的文化傳承與轉

變。資料分析顯示，在居住安排上，成年子女與父母同住者已不足四成，但「老來從子」的觀念仍發揮一定影響：兒子較多與父母同住，或就近居住；然而，無論是親身會面，還是透過其他方法，女兒都與非同住父母保持較密切的聯繫。在反饋照顧上，兒子給予財務支援較頻繁，而女兒提供勞務、資訊和情感協助皆較多，這與「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分工理念別無二致。在關係素質上，父母子女滿意彼此關係的比例高近九成；居所愈接近、聯繫愈親密、互助愈頻密者，均愈傾向滿意與父母的關係，男性的滿意度低於女性，但控制代際互助的影響可顯著拉近兩性差異。

維持合理生育水平是紓緩人口老化的基本方法。自 1984 年起，台灣總生育率便從人口替換水平持續下滑。在第七章，楊文山和陳如涵運用台灣社會意向調查，從風險的角度，探討民眾對風險感知與生育行為的關係。研究結果證實，台灣已婚民眾的生育決策，會隨認知風險的高低而有差異。在個人主義化方面，教育程度愈高、愈支持同居者，也愈傾向少生甚至不生育子女；經濟獨立風險與生育決策的關係並不明顯。在外部環境風險方面，愈相信社會公平、愈不擔心未來發生核能事故者，生養子女數則會偏高。總而言之，台灣民眾已不將生育視為理所當然，生兒育女反而成為一種風險，會帶來各種不確定性，因此須經過仔細評估及規劃後果，才會作出生育決策；風險認知愈高，生育意願便愈低。

從 1980 年代起，台灣為產業發展和社會需求引進外地勞工和婚姻移民，後者大多來自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總數已逼近原住民的人口規模，對社會的衝擊也最直接。在第八章，陳玉華和伊慶春利用 2012 年台灣社會意向調查資料，探討民眾對婚姻移民的態度及其影響因素。她們發現，認同中國大陸和東南亞配偶為台灣社會帶來負面影響者，都高達六成。民眾接受還是排斥婚姻移民，與社會接觸經驗沒有顯著的關聯；然而，個人的社經背景、政黨認同，以及對台灣經濟現況的評估，則有直

接的影響，如年長、女性、已婚、居於鄉村地區、閩客族群，以及不滿經濟現況的人士，對婚姻移民的接受度均普遍偏低。此外，高學歷和認同泛藍政黨人士，僅較接受大陸配偶，對東南亞配偶的態度，則與其他人士無異；而雇主、自營業者，和認同泛綠政黨人士，對東南亞配偶的接受度都相對偏低。

在第九章，吳齊殷和楊宥指出網際網路的發展，雖未撼動集體性的社會結構，但已能提供個人掙脫社會結構位置（如性別、居住地、種族）桎梏的動能。台灣各界也期待網際網路所構築的虛擬社會，能有助公民社會的形成與運作。鑒於公民社會的首要質素是社會信任，他們運用台灣社會意向調查，探討了網民在網際網路上的行動經驗與社會信任感的關係。研究顯示，網路使用行為似會透過「身分認同」及「社會價值」這兩個社會體系構成核心，對他人產生信任。此外，民眾在網際網路的生活經驗，包括與陌生人接觸、產生關係、建構連結，乃至生成其他非隨機的社會連帶等，對社會信任也會有直接影響。

社會公平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基石，但平均主義卻會削弱個人的積極性，窒礙競爭。因此，社會公平與經濟發展之間，必須取得適切、大眾信服的平衡。在第十章，鄭宏泰和尹寶珊運用台港社會意向調查，比較兩地當前社會處境、發展格局與政治氛圍等不同因素，如何影響民眾的社會公平觀念。根據調查所得，兩地學歷較低、收入較低、本土身分認同者，都較傾向認為社會不公平，而公平感較低者，較傾向支持社會運動、認同民主制度、願意在選舉中投票給泛綠或泛民主派參選人，以及對「中國因素」的負面影響，感受尤其強烈。然而，在2000至2014年間，台灣民眾的不公平感一直比香港強烈，波動較大，而且有增無減，觀感趨向兩極化，與堅尼系數的變化截然不同；反之，香港的堅尼系數雖持續上升，民眾的不公平感卻輾轉下滑，且轉向公平與持平一方。兩地的主觀公平感有別，與客觀貧富分布數據都出現落差，原因或在於台港的政府治理模式、

民主發展路徑，以及經濟發展哲學皆不盡相同，對於社會公平問題的看法乃呈現差異，對貧富不均問題的容忍程度亦有分別。

總括而言，本書各篇論文都運用最新的隨機抽樣民意調查資料，就不同社會現況與變遷的面向，提供敏銳的觀察和深入的分析。由進行民意調查、籌辦研討會，到本書得以問世，我們要感謝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的行政支持和經費資助。對參與歷次社會意向調查和「2015台灣－香港社會學與社會意向研討會」的專家學者，我們深表感謝。香港亞太研究所的黃子為、張晶、梁月蓮和陳韻晴協助資料分析和文稿校對等工作，也在此謹表謝意。

蕭新煌、趙永佳、尹寶珊

2016年2月

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